

毛泽东诗词中的红旗

□ 王 军

红旗，中国革命的色彩。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山下旌旗在望”，到中央苏区“风展红旗如画”；从两万五千里长征“红旗漫卷西风”，到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从离别韶山32年作“红旗卷起农奴戟”，到重上井冈山“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都折射出毛泽东的“红旗情结”。可以说，“红旗意象”“红旗情结”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历史进程和民族命运的塑造之中，体现着强烈的革命时代精神，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8年8月，陈毅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时，曾以称赞的口吻说：“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8月20日，毛泽东即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到湖南来这几天，看到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则已另眼相看，认定“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秋收起义前夜，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赶制了100面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毛泽东《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这是最早的红旗。



秋收起义后，红旗插上井冈山。在井冈山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诗词中体现了浓浓的“红旗情结”。比如：“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西江月·井冈山》）、“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清平乐·蒋桂战争》）、“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等。

1930年1月的《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毛泽东在“红旗情结”中，既感受现实，更关注理想。从这首小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日后在艺术上提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相结合趣味的滥觞。这首词正如毛泽东在同年同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章中描绘的那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一词一文，展现了红军战士的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正如毛泽东所言，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当时，红军指战员平均年龄不足20岁，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红军战胜千难万险，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是红旗，是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理想而宁可奋斗牺牲的精神。1935年10月，在长征到达六盘山时，毛泽东作诗：“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实录毛泽东》里战士回忆，“战士们举着的红旗在迎风招展，我们的队伍像奔腾的铁流，涌向前方。此情此景，真是壮观万分，我们的心情也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1935年10月是个节点，此前一年，长征开始；此后一年，胜利会师。此前14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再过14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经过“风卷红旗过大关”“壁上红旗飘落照”“万水千山只等闲”“百万雄师过大江”后，毛泽东终于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按下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民族命运和国家面貌。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所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红旗情结”始终没有减退。1950年11月，在抗美援朝关键时期，诗人柳亚子作了“天安门上万红妍”。毛泽东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妙香山战旗妍。”

1959年，毛泽东回到老家韶山，离别故土已经32年了，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毛泽东的“红旗情结”在他的战友、同事诗词中也多有体现。1955年6月，周世钊陪同毛泽东游岳麓山后作诗：“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影卷红霞。”1959年底，针对国际上反华浪潮甚嚣尘上，毛泽东作了三首《读报有感》，董必武和诗五首，其中一句是“革命红旗要擎紧，责无旁贷是神州”。1963年郭沫若作了两首诗，《满江红·领袖颂》和《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其中有“迎东风革命展红旗”“红旗卷地地如绣”等句。1964年10月，毛泽东观看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在听到《秋收起义歌》里“秋收起义成了功，一杆大旗满地红”时，右手托下巴，神情凝重。

1965年，叶剑英写了一首七律《望远》，请毛泽东指正。这首诗首联是：“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反映了马恩列斯离世之后，共产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身上。毛泽东非常欣赏，将题目改为《远望》，其他一字未动推荐到《光明日报》副刊发表。同年生日这天，毛泽东手书这首诗送给儿子岸青和儿媳邵华。

（摘自2019年7月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八女投江：宁死不屈的巾帼战士

□ 王建威

初冬时节，牡丹江的支流——乌斯浑河在漫漫草木枯黄中静静流淌。“乌斯浑”是满语，有凶狠的河流之意。80多年前，这条裹挟着侵华日军罪恶子弹的凶狠之河，吞噬了8位宁死不屈的英雄女儿。而今，“八女投江”纪念碑矗立在乌斯浑河东岸，透过历史的尘烟，深情凝望着这片承载过血与火的土地锻铸出的富饶与祥和。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政治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

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她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5军，后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志同道合，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调到第5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队长和指导员。1938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第5军第1师部队西征，任妇女团政治指导员。

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1938年7月12日，参加了攻打横山镇战斗。是年10月上旬，队伍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女团上述8名成员，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毅然放弃渡河，

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她们却被敌人围困于河边。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面对日伪军逼降，女战士们誓死不屈。冷云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摘自2018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建立监督机制的最初尝试

□ 陈其明

1925年2月，奉中共中央之命，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名义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构，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一经宣告成立，就在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不久后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选举产生

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其下设机构就有监察委员会。另外，作为广东区监委书记的林伟民，也因久负盛名被选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执委会委员长兼总干事。

（摘自2018年第1期《党史文苑》，原标题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诞生始末（上）》）

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其下设机构就有监察委员会。另外，作为广东区监委书记的林伟民，也因久负盛名被选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执委会委员长兼总干事。

（摘自2018年第1期《党史文苑》，原标题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诞生始末（上）》）

我爷爷方志敏是这样的人

□ 方华清（方志敏长孙）



我的爷爷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出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爷爷领导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十军，先后担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11月底，爷爷奉命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追堵截，不幸被俘。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

爷爷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信念坚定、做事务实、清廉干净的崇高品质光耀中华，并成为我们家的传家宝，深深地影响了我。

爷爷是有崇高信仰的人

爷爷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传家宝就是信念坚定。“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是爷爷在就义之前的慷慨陈词，其中流露出的坚定信念我们至今还能深切感受得到。

爷爷对党的忠诚信仰，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并日益坚定的。爷爷8岁启蒙，就读于弋阳叠山书院。书院以“叠山”命名是为了纪念南宋著名爱国英雄谢叠山，谢叠山变卖家产组织义军抗击元兵侵略，兵败被俘后，拒绝高官厚禄诱惑，最后绝食殉国。谢叠山的英勇事迹对爷爷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

大影响。

1916年秋，爷爷进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学习，在校组织进步团体“九区青年社”。1920年，爷爷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应用机械科学习，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在校期间，爷爷因领导学生反对腐败教育，要求教育改革而被开除。

1922年7月，爷爷来到上海。一天，爷爷应朋友之邀去法租界的公园散心，一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爷爷说：“这几个字射入我眼中时，全身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让我感觉到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为此，爷爷在求学真理的过程中潜心求索救国救民之道。

1924年3月，爷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爷爷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他视为政治要犯，妄图通过“怀柔”手段改变其共产主义信仰。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和严刑逼供，爷爷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当得知我的奶奶和父亲也不幸被捕时，爷爷说：“我已失去自由，妻子和儿女如何顾得了？只能舍弃他们。”我们全家祖孙三代共30余人，在爷爷思想和行动感召下，大多参加了革命。爷爷的胞弟方志慧，堂兄弟方志纯、方远辉、方远杰等都成为革命先锋，方远

杰、方志慧、方远辉后来相继献出了年轻生命。无产阶级革命者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但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却只能“舍小家顾大家”，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爷爷是有开拓精神的人

爷爷战斗的岁月，是革命斗争形势最困难、最艰苦的年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爷爷毫不气馁，毅然回到赣东北根据地，在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1928年至1933年，爷爷从赣东北地区环境较为封闭的实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爷爷曾撰文回忆：“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难。如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还解决其他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的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

根据地建立后，如何解决财政问题，是各个根据地面临的共同难题。一开始普遍采取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之计还是毛泽东1934年1月所指出的“要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1930年

冬，爷爷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土豪打光了，财政问题非常严峻。1931年初，爷爷开始转变经济政策，比中央苏区早了两年。

鉴于敌人对苏区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爷爷就向群众广泛征求建议，听取群众意见，广开财源，打破敌人封锁。当时县区委都设有财经机构，从革命群众中挑选政治可靠并有“点本事”的人为工作人员，其中不乏“智多星”型的人物，提出了许多对策。如，立足本地资源开办造纸、纺织、被服、织袜工厂等；发展香菇、茶叶、皮毛、红莲子等土特产的生产；创建消费合作社、合作商店、工农药店；设立物资检查处、对外贸易处、船舶检查处征税；开放集市贸易、疏通物资交流；等等。爷爷率先在苏区和白区交界的村镇设立了19个贸易处，用农副土特产品从白区商人那里换取苏区需要的各种物资，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胆识的。

这项举措1931年当年即见成效，下半年赣东北苏区的财政就比较充裕了。国库保管银元最多时达七八十万元，除供给军需和地方行政外，还供应闽北，支援中央苏区。1933年春，爷爷创建的赣东北苏区主力部队红十军奉命调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从赣东北给中央苏区带来了2000两黄金、100余万元银元和40余箱药品。周恩来、朱德非常高

兴，称赞不已：“方志敏同志不简单，你们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

爷爷曾数次出任军职，带兵打仗时间虽短，但成绩很大。究其原因，在于他做事务实，方法得当。爷爷经常深入队伍，不厌其烦地去检查、指导、督促，解决指战员的实际困难。由于他的出色工作，第一次任军职时，红军实力发展了3倍以上，在3个月内连续取得作战的大胜利，苏区扩大到纵横500余里，人口100多万。第二次任军职时，指挥红十军不但在贵溪、余江3仗皆捷，巩固了老苏区，而且进军闽北，打了10多仗，仗仗皆胜，树立了红十军在闽北的军威，奠定了闽北苏区和红军向前发展的基础。

爷爷是特别清廉干净的人

爷爷16岁时，就写下“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洁梅兰”的楹联，以高洁的松竹梅兰自励。在他从事革命的十几年来，从不奢侈浪费，虽身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但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

赣东北八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有人对我曾祖母说：“方志敏当苏维埃主席啦，好大的官哩！你家里有难处，他顾不过来，钱总是有的，怎么不去要一点儿？”曾祖母一听，觉得有

道理，“儿子的饷银，当妈的理当用得。”于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找爷爷要饷银来了。爷爷何尝不知道家里的困难？仅他的学费，从小学到大学，连本带利，家里就欠债达700多银元之巨。爷爷参加革命后，家里又被敌人烧劫了20多次。曾祖母是迫于无奈，才来向他要钱。可革命的钱不能私用啊！爷爷内疚而诚恳地对曾祖母说：“妈，我是当了苏维埃主席，可我们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嘛，现在没有，将来会发的。信江苏维埃刚建立，革命才开了个头，我们每天的饭钱才7分呢，实在没钱给您。”纯朴善良而通情达理的曾祖母听了，说：“晓得了，妈这一趟没有白来，明白了你是当穷人的主席，我虽然生活苦点儿，但心里舒坦。”

爷爷从1924年入党到1935年就义，在参加革命的10多年中，他在闽浙赣苏区担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从来都不搞特权。他与干部、战士吃一样的大灶，丝毫没有一点特殊。爷爷早期投身革命染上重病，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经常病倒在床榻上。然而，他一心想到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想到过自己，始终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爷爷被捕时，两个国民党士兵想从这位共产党大官身上搜出大洋和金条，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只有几件旧衣服和几双缝上底的线袜，“从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摸到裤底，除了一只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

“清贫，不是贫穷，而是一种境界。”爷爷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爷爷的座右铭，也是他留给家人、留给共产党人最宝贵的传家宝。

（摘自2019年第2期《党建》，原标题为《我爷爷是这样的人》）